

大众周末

新闻关注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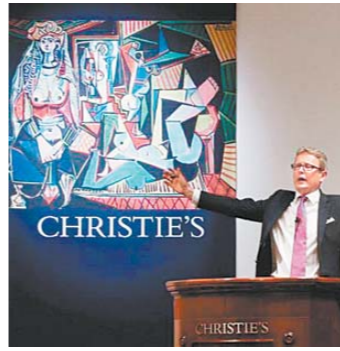
母亲街头暴打将参与暴乱的儿子

在美国巴尔的摩骚乱地区，一个母亲抓住了正要参与暴乱的儿子并暴打。她的儿子虽然头戴面罩，但还是被妈妈一眼认出来。



男子跳下高温火坑 探险地狱之门

一个冒险家在土库曼斯坦冒着超过1000摄氏度的高温，下降30.48米，进入满是火苗的大坑。前苏联科学家于1971年曾发现这里丰富的地下天然气，由于开采时发生事故，苏方只好点燃天然气，大火燃烧了40余年未灭。



毕加索作品 创拍卖天价纪录

佳士得纽约拍卖会上，毕加索的《阿尔及尔的女人(O版本)》卖出1.794亿美元(约合11.1亿元人民币)，打破了英国画家培根《弗洛伊德三习作》前年创下的1.42亿美元纪录，成为全球最贵拍卖画作。



日本艺妓的神秘生活

400年来，艺妓一直是日本文化的一部分。她们经常被误认为妓女，其实她们卖艺不卖身。艺妓必须在现代世界保持传统，放弃家里舒适的生活以及使用智能手机。

周末人物·中国新闻名专栏

一百年前，随着《新青年》的呱呱坠地，迸发了一场新文化运动，一批文化精英开始挽袖提笔，奔走呐喊。“德先生”“赛先生”舶来中国，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汇成巨澜，新青年们应时而动，新文化、新气象星点闪现。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多年来从事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现代文学研究，“于文本中见历史，于细节处显精神”，卓然成家。陈先生说，回眸新文化运动百年史，感慨万千——

陈平原：触摸旧报刊，就是触摸历史

□ 本报记者 卢昱 逢春阶



在北京大学人文学苑，陈平原对本报记者侃侃而谈。

5月12日下午，在北京大学人文学苑，我们见到了陈平原先生。雅号“平原君”的他深受学生喜爱，被公认为“极有魅力”。在学生眼中，他温和、亲切，爱请学生吃饭，时而有“冷幽默”。记者约访时，他给出两个时间段，由记者自主选择，他准时“奉陪”。

面对媒体人，陈先生开门见山：“我研究的领域，离不开报刊，也就是传媒。”多年前他就任北大主持召开过“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”研讨会，敏锐地意识到：“大众传媒在建构‘国民意识’、制造‘时尚’与‘潮流’的同时，也在创造‘现代文学’。一个简单的事实是，‘现代文学’之不同于‘古典文学’，除了众所周知的思想意识、审美趣味、语言工具等，还与其生产过程以及发表形式密切相关。在文学创作中，报章等大众传媒不仅仅是工具，而且已深深嵌入写作者的思维和表达。”

自觉跟五四新文化血脉相通

陈平原先生说4月19日去过济南，参加了由山东大学主办的“五四百年论坛启动仪式暨《新青年》创刊百年学术研讨会”，他从“文白之争”谈起，通过强调繁简、拼音化及方言的能量来回应对于“新文化”的质疑。

与“五四新文化”结缘，对陈平原来说，既是专业，也是人生。

人生的转折，推着陈平原向前走。1978年春，24岁的陈平原坐上长途汽车，平生第一次离开家乡潮汕，进入中山大学中文系。在这之前，他做了八年的知青，其中几年是当民办教师。

“那时候，正赶上思想解放运动，我们模仿五四时代的‘新青年’，谈启蒙、办杂志、思考中国的命运。后来读研究生，学的是中国现代文学，那就更得跟‘五四’对话了。”陈平原回忆道。

“后来，我在北大读博士，毕业后长期在这里教书。对于北大人来说，‘五四’是个值得永远追怀的关键时刻。无论学术、思想还是文章趣味，我自觉跟五四新文化的血脉相通。”陈平原说道。

可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，“五四”在空间和空间上，离他们越来越遥远。人们对“五四”的真实面貌以及历史场景，知道得越来越少，只记得一些抽象的概念。陈平原分析，正因为越来越符号化了，曾经生机勃勃的“五四”，就变得不怎么可爱了。

“回到现场”是陈平原为探究“五四”点明的路径。“那是个众声喧哗的时代。只不过经过几十年的阐释，某些场景被凸显，某些记忆被淹没。”陈平原说。

在陈平原看来，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次成功的“文化断裂”。他给出了几个理由，其中一个理由是，成功的“文化断裂”，当事人必须掌握话语权，故能自我经典化。

在“五四四周年”，学生抗议运动还余波荡漾时，命名活动就已开始。“五四运动”一词，首次见于1919年5月26日《每周评论》第23期上。北大学生领袖罗家伦用“毅”的笔名，发表了《五四运动的精神》。

“此后，新文化人利用其掌握的报刊、教科书等，连篇累牍地对‘五四’进行追怀、纪念与阐释。如此迅速地自我经典化，这样的机遇，实属罕见。”旧报刊是会说话的，一页页泛黄，但曾经掌握着舆论制高点，“传媒的力量大啊！”陈平原说。

至于“礼教吃人”的控诉，“打倒孔家店”的口号，在1920年代的中国，只是对于知识青年有较大的感召力。“五四”的精神遗产，很长时间里并没有深入广袤的乡村与小镇。只不过是死水微澜，预示着古老中国的初步觉醒。”对五四新文化史料了然于胸的陈平原，言之凿凿。

五四新文化最为迷人之处

陈平原在深思那段历史。他将“五四”和“新文化”绑在一起：“我不主张将‘五四’局限在1919年5月4日那一天在北京发生的学生抗议运动，而希望它兼顾1915到1922年间在神州大地新次展开的文学革命、思想革命与政治革命，这才是‘五四新文化’最为迷人之处。”

在陈平原看来，“新文化”运动最为迷人之处在于其丰富性。“不光是激进的论述、改良的思想，更多的是一种探索，全社会上下求索，一时分不清是对还是错。回望这一百年，中国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从那里来，后来的各种思想学说、论争、主义、立场也都从那个地方来。”

用这三组词来描述彼时风采，“每一种力量都很活跃，都有生存空间，都得到了很好的展现，这样的机遇，真是千载难逢。没有一个是不容置疑的主潮，即使它力量很大，也不是压倒性的、排他的，五四新文化的迷人之处就在这复杂性。”

运动酝酿已久，新文化却早就进驻中国知识分子的脑海中。“一般来说，我谈新文化从晚清说起，从1898年到1927年，这三十年是中国社会思想、文化转型的大时代。”晚清与五四，本来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。”陈平原说道。

在陈平原的视野中，每当谈论“五四新文化”时，他都会格外关注“五四”中的“晚清”；反过来，研究“晚清”时，则努力开辟“晚清”中的“五四”。

究其原因，他给出自己的见解：“在我看来，正是‘晚清与五四’这两代人的合谋与合力，完成了中国文化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。”

“就年龄而言，‘晚清与五四’是两代人，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思想学术的转折关头，这两代人面对同样的问题，其知识结构与思维方式大同小异，可以放在一起讨论。”陈平原继续解释道。

这两代人中，有康有为、梁启超、章太炎、严复等人，也有蔡元培、陈独秀、李大钊、鲁迅、胡适等人，还有“横空出世”的傅斯年、罗家伦、邓中夏、杨振声等，他们同样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发挥作用。

“两代人之间，有区隔，但更有联系。尤其是放长视野，这一点看得更清晰。他们的工作目标大体一致，比如思想革命、教育改革、提倡白话文、接纳域外文学等，很多想法是一脉相承的。”陈平原说，“光看结论没有说服力，你去翻看当时的报刊，一目了然。”

作为物质文化的“现代文学”

“我之所以试图重建历史现场，目的是恢复某种真切、生动、具体的历史感觉，避免因抽象化而失去原本充沛的生命力。历史事件早就远去，但有些东西我们必须记忆。”陈平原阐释自己的历史观，“流行的‘大理论’，必须与个人的‘小感觉’合拍，这样做出来的才是好文章，不僵硬，有温情。所谓小感觉，根基在于你大量触摸旧报刊，根基在于你的过往经验。”

解剖“新文化”运动，同样离不开重建历史现场。在文学、思想、政治革命新次开展的荒野中，陈平原先抓住了“文学”这一最初的萌芽，而“报章”则成了萌芽的底色。

早在近30年前，陈平原在做博士论文——《中国小说叙述模式的转变》时，就特别关注到晚清报刊出现后，改变了中国文学的进程。“报刊的写作、发表和以前的文人的吟诗作赋，与最后集结出版完全不同。早上写出来的文章，下午就可以印出来，晚上就可以名满天下。这种大众传媒的形式，不仅制造时尚和潮流，还创造了现代文学。”

“报章里面不同栏目之间的对话，甚至一个版面里面诸多文体之间的对话、抗争、影响，最

后会创造出很多新的表达方式。”陈平原解释道。

“我当时意识到晚清小说的片段化，像鲁迅所说‘虽云长篇，颇同短制’。可为什么晚清的小说，像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《官场现形记》等，会变成每一章讲述一个独立的故事呢？我们早就有结构完整的长篇小说了，可到了晚清为什么反而退步，变成一个集锦式的小说呢？”陈平原当年的疑惑在翻阅旧报刊中找到答案。

“那就是报刊连载。报刊连载导致每一回小说必须自成起讫，这样才能吸引读者。小说连载改变了中国小说写作的方式。”陈平原说道。

在北大中文系，“中国现代文学”专业的学生，一定要做一点旧报纸、旧杂志的考察，去触摸这些旧物感受历史。

“作为文学史家，你必须意识到，很多作家在作品集结成书时，对原作加以删改，以后又随着意识形态的变化而不断修改自家的著述。你只读文集，很容易上当。最典型的例子是郭沫若的诗集，以往的文学史家常根据《女神》后期的版本来论证郭沫若五四时期的文学及政治思想，殊不知郭先生与时俱进，不断修正自己的作品。所以说，对于所有作品来说，最初发表在报刊上的样子，是最值得关注的。”

在陈平原看来，旧报刊，是作为物质文化的“现代文学”。具体说，就是作为一种物质形态的书刊，本身包含有审美特征、价值或某种经济属性等。后人去触摸它，和翻看日后集结出版或重印的书籍，感觉是截然不同的。

让更多人才璀璨在学术天空

最近十几年，在文学史、学术史之外，“大学史”成了陈平原另一个研究的焦点。在他看来，大学不仅仅是生产知识，培养学生，出科研成果，出各种“大师”的地方，还有一个义不容辞的责任——通过知识和思想的必须，介入到当代中国的社会变革里。

“作为对现代大学充满关怀、对中国大学往哪里走心存疑虑的人文学者，我必须直面‘五四新文化人’的洞见与偏见。在这个意义上，不断跟‘五四’对话，是我的宿命。”陈平原说道。

五四时代，大学里不乏有个性、有情怀、有情趣的学者。回顾百年发展历程，当前高校中，这一类学者的数量呈下滑趋势。

回顾既往，陈平原认为，“在一段时间，比如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，我们强调思想改造，让人们努力认同于群体，或者某一种统一的意识形态，不主张发展个性，强调集体认同感。意识形态和思想潮流导致学者不敢有个性。十年动乱时期就更不用说了，那是一个不欣赏天才，或者说说是蔑视天才，甚至某种意义上是扼杀天才的时代。”

“最近二十年是另外一个潮流造成的，那就是学术评鉴。我们的大学越来越发达，我们的制度也越来越严密，什么都量化了，在落实的过程中，那

些有着鲜明个性的人会被淘汰掉。”陈平原继续解释道。

按照常理，学术兴趣广泛本应是人文学者的情怀和趣味，可当下的大学却没有这种环境。“学者们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，每天一睁眼，课题完成了没有，论文数量够不够，都像一把剑悬在年轻学者头上。评估制度在保证学术质量的同时，扼杀了很多人的个性，它保证了一个底线，同时也立了天花板。”陈平原分析道。

“保了底线的意思是，严格的评估制度会导致太差的人没办法入围。有天花板的意思是，太特别的人找不到了，或者有棱角的人被硬压着，不敢自由发挥。”

“你跟人家太不一样了，或者你的思考太特别，太前卫了，或者说叛逆性太强了，在这个评价制度里面，必定吃大亏。它不是以政治的形式，而是以学术的形式，来限制你。而且，是自然而然地走到这一步，不是有意识的。”陈平原感叹道。

“其实，必须对日渐严密的现代学术制度保留某种警惕，意识到它可能会导致的问题。所以，要有一定的张力和魄力，保持独立思考的空间和独立发展的可能性。”陈平原再三强调“警惕”的不可或缺。

在这份机警下，陈平原对学生的学术道路有着自己的思路：走得不顺的时候会想办法帮忙，走得顺畅时会批评他们。“要记得，走得顺畅是因为你顺着这个考核制度走，你不可能有大的发展。因为你适应这个体制，很容易不自觉地屈从于这个潮流，不敢特立独行，也没办法长大。”

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，反思当下高校不合理做法，让更多的人才璀璨在学术天空。这是陈平原先生祈愿的。

成功的报纸离不开副刊

“五四”时期的报纸，精彩纷呈，其中有四大副刊夺人眼球：《时事新报》的副刊《学灯》，北京《晨报》的副刊《晨报副刊》，上海《民国日报》的副刊《觉悟》，北京《京报》的《京报副刊》，它们为现代文学的繁荣立下汗马功劳。比如鲁迅的《阿Q正传》就发表在《晨报》的副刊《晨报副刊》上。

报纸有其政治、经济、商业、娱乐等层面的功能，副刊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层面。“副刊最初是给报纸加分的，很多报纸靠副刊吸引读者来生存。”陈平原说道。

据陈平原介绍，民国时期，报纸副刊最大的特点在于，主持人是作家或学者，且以礼聘的形式，作为报社的客卿。“那时副刊相对于整个报纸来说，它的立场、观点、趣味有某种独立性。关键的问题是，它给报纸招揽读者。”

而今，作为关注百年报章变化的专家，陈平原特别关注纸媒在何处去。

“其实，一份报纸想编给所有人看是不现实的，必须有准确的读者定位，要有所舍弃。我判断，报纸会越来越深度分析的道路，就速度而言，再快的报纸也抵挡不住手机或电子媒体。报纸将弱化信息传播，强化深度分析。”陈平原说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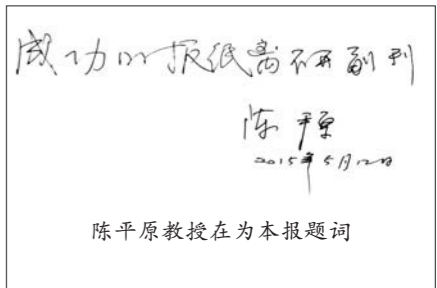
报纸之所以被读者翻于掌上，是因读报的姿态和电脑前不断翻页、迅速浏览是不一样的。在陈平原的经验中，如果想要看深度报道和理论分析，还是要看报纸。

“当报人努力压缩篇幅，让文章变成豆腐块时，会丢失很大一部分作者和读者。好文章不怕长。”陈平原在为纸媒谋出路，“报纸能够安身立命，能够被大家关注，能够被阅读，它的长处在哪里？专题性，报纸会更占优势。报社集中了一批专门人才，他们能以批判性、鉴赏性、思想性的眼光来面对复杂事件，并作出分析。”

“我们今天必须反省，纸媒、出版、电视行业，是否一定以销量和收视率为评价标准？我觉得是谁在读，谁在看，更关键。一张报纸，可能只有数百个理想读者，但他们有很好的趣味、眼光、声音，影响可能更深远。不能只看销量，还要看影响力，想方设法影响最有影响力的人群。”陈平原为纸媒支招。

“纸媒要获得读者的话，就其传播效果而言，它不能向娱乐性的东西看齐，它要影响高端读者，或者影响有立场、有趣味、有眼光的人，人数不用特别多。这部分人往往特别看重副刊，所以我成功的报纸离不开副刊。”

历史不是供人赏玩，供人戏说，更不是供人诅咒的。陈平原真诚希望，现代传媒能有更为坦荡的胸襟，更为开阔的视野，更为深刻的反省，奉献更为精彩的言说，准确传播新文化运动，光大五四精神，让后人翻看今天的报章时也怦然心动。



陈平原教授在为本报题词

我负责否定学生

□ 逢春阶 卢昱

陈平原先生深情回忆，自己读博士的时候，过得很愉快。“我每周到王瑶先生家里去一两次，跟王先生聊天。王先生每天晚上工作，白天睡觉，十一二点之后才会起床。所以我每次都是下午去，听王先生侃大山，有时候是我问他答。王先生是喝茶的，抽烟的。所以王先生总是说自己已经过了几十年‘水深火热’（指抽烟喝茶）的煎熬，‘颠倒黑白’（指牙齿变黑，头发变白），我就这样在王先生烟雾缭绕的‘熏陶’下度过了三年。那时候没有博士课程，其他的老先生也不带学生，带博士的就王先生一位。王先生经常会让我去找其他的老师，跟他们去聊天，比如说吴组缃、季镇淮、林庚。但是也没有课程，只是私下聊天。”

“对于我来说，一个不太好的地方就是无论硕士阶段还是博士阶段，都没有受过系统的训练，但一个好处是任由我自由阅读、思考和选择。博士论文写完，准备答辩的时候，教育部规定：在进行博士答辩之前必须有一个博士资格考试。而北大之前对此一无所知。所以我在完成博士论文之后又补了博士资格考试。当时的博士制度就是那样慢慢建立起来的，这个制度建立起来的时候，我也就快毕业了。”念及旧时“荒唐”，陈平原笑道。

在知识和思想介入当代社会变革的过程中，“梗阻”在当下大学教育中不时冒出。“制度最有魅力的地方，是在将生未生之际，一旦定型，它就会有很多的束缚。现在的大学生，从一开始入校，就面临一大堆制度，每一步都把关。好处是不会出现大的纰漏，坏处是所有人的，不论才智如何，都按制度来规范。很难不拘一格，成就天纵之才。”陈平原略显忧虑地说。

陈平原说：“现在有的老师特别希望弟子招进来以后，我开一条路，请你们一个人做一小点，如果是按照这个思路来做的话，所有的学生都超不过老师。而王瑶先生当年指导博士生，他有观点，就是‘我不负责肯定你，我负责否定你。我不会告诉你哪个题目值得做，但我会告诉你，这个不合适，你另外回去想想’，这样你就得拼命去挣扎，就得拼命想办法。”

陈平原先生如今依王瑶先生旧法：“我不会告诉学生哪个题目值得做，但我会让学生来跟我想想做什么，我会告诉学生是否合适，不合适再回去想。我会根据经验，根据学生的才性、学术经历、学界潮流，以及课题本身发展的可能性等，来作出判断。若不合适，再回去想。”

在老师的逼迫下，学生在不断地思考问题；在被否定、极力挣扎的同时，学生也获得了清晰的方向感和判断路径。“从结果来看，我发现学生们各不一样，因为他们本身的基础、才智、兴趣不一样，他们发展出来有各自的天地。如果不是的话，将来所有的学生会被导师一个人给笼罩住。”种瓜得瓜，陈平原甚是欣慰。

责任编辑 郭爱凤